

赤焰灼心：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准则与宣传动员研究

丁丽琼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首次尝试,也是其建立情感体制的开端。中共在当时严峻的内外形势和阶级分析法的影响下,形成了以阶级感情为中心、强调高涨的斗争情绪的情感准则。这一情感准则藉由宣传动员得到强化和扩散,通过脸谱化的敌我形象呈现、多层次的宣传网络渗透、高密度的运动竞赛批评、情绪化的修辞句式表达、嵌入式的情感指导展示,在苏区内部造成了紧张激烈的革命空气,由此形成了中共严格的情感体制。情感不仅提示了理解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和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切入点,也有助于反思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所引发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情感史;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情感准则;宣传动员

【作者简介】丁丽琼,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京),2024.2.25~40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国际传播创新话语体系构建及创新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TJWHSX2302-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31年11月7日宣告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①,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②。新闻宣传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委制内、系统性、全域化新闻舆论传播的先河^③。

既有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宣传动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宣传活动本身,对其内容、载体、话语等进行描述和讨论^④,而对其在党实现战略目标乃至党的政治文化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和背后的深层逻辑及作用机制的分析则相对比较欠缺。因此,有必要将宣传动员置于党的核心特质与整体气质中进行考察。

中国共产党既是使命型政党,也是情感型政

党^⑤。党的情感特质不仅来自自身的体认,也是其感召力量的重要来源。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将中共对情感的成功调动视为其战胜国民党并实现革命宏图的关键因素,并指出中共认识到“情感工作”的重要性正是起源于江西时期,她还提示人们去理解中共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方式^⑥。在众多给予“新革命史”灵感与方法论启发的理论和学科视野中,情感史视野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意义重大^⑦。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理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学术研究“情感转向”^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贡献之一在于首次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理性转到了感性的层面,代表了历史学的“一个崭新方向”^⑨。

情感史理论起源于西方,重心也在欧美。目前国内关于情感史的研究还处于理论的译介阶段,鲜

有将情感史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实际研究中的^⑩。还有不多的研究从情感动员角度对中国革命进行考察,但主要集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⑪,对中央苏区时期则论述较少。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往往将情感视为宣传动员的一种技巧和手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之于党自身重要性和宣传动员内在逻辑的发掘。

情感史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或群体宣称的关于各种情感的标准与个体及群体情感体验的类型之间有何关联^⑫。通过考察“基本情感”标准的变化^⑬、社会生活中共存的情感模式或风格及与之相应的多元情感社区^⑭,以及情感表达及特定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下的人类境况^⑮等,情感史研究跳出了情感与理性以及“情感”自身所包含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的二元对立,不是去追问一个人情感是否发自内心,而是考察人们表达出的情感,以及社会、文化、特定的环境、群体等的情感准则^⑯,从使得情感的历史研究成为可能。

本文所依据的情感史理论主要来自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雷迪的《情感导航》一书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在情感史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⑰。其核心观点在于认为“情感控制是权力行使的真正场所”^⑱。“情感体制”是该理论的核心,意指“一整套的规范的情感(normative emotions)和表达及反复灌输这一情感准则的官方仪式、实践和情感表达,它是任何稳定的政治体制的必要基础”^⑲。

对“情感”的定义曾长期限制了情感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情感史学家的研究方法,雷迪并未假定“基本情绪”,或强调特定的“情感词”,他感兴趣的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中允许或者不允许情感自我改变或探索的方式^⑳。

他创造了情感表达(emotives)一词,以区别于情感。他认为情感是在内外刺激下产生的、松散连接着、有共同目标的一系列思想材料,这些材料太庞大了,无法被立刻翻译成某种语言或行为表达。而“情感表达”则意指将这些思想材料以语言或行为的方式“翻译”出来,这种“翻译”具有两层意义:陈述状态和改变现状。因此,“情感表达”不仅是管理性的,也

是探索性的,它不仅反映出我们对于自身经验及所处情形的理解,也可能重塑身体所感觉到的情感,造成行为目标的冲突。而规范的情感,即情感准则正是情感表达的重要参照系。情感准则所允许的“情感自由”(emotional liberty)又成为衡量一个情感体制是严格还是宽松的重要标准。

由此,根据上述理论,本文试图探究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下占主导地位的情感表达即情感准则是什么?这一情感准则又是如何经宣传动员扩散和强化,从而形成和确立了时下的情感体制的。

一、党的政治策略:以阶级划分敌我

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成立时所面临的严峻的内外形势和中共一直以来坚持的阶级分析法,使得这一时期中共的政治策略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斗争性”,此时常提到的一句话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分析所引发的紧张与对立。

一方面,从1930年底起,国民党军队持续发动对根据地的“围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另一方面,1931年初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重申了共产国际路线的重要地位,要求肃清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引发了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把历史理解为路线斗争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路线”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指示政治活动的具体方向或指导原则,并且与一条道路是否被认为是革命的直接相关^㉒。而作为高扬于1920年代的“革命”话语,常与“反革命”并行出现,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㉓,由此加剧了内部的斗争。

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共一直所依赖的就是阶级分析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只有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具有选举权,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则无此权利。同时宣称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㉔。这也奠定了这一时期总的基调,即以阶级划分敌我。

但是,这一时期的阶级分析又有所变化。一是阶级分析范围的扩大。该方法不仅用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也体现在党员招募、号召群众运动等各个方面,甚至司法审判,首先也要参照阶级成份判罪^⑤。同时,阶级分析不仅是横向展开的,还是动态发展的,查田运动中提出阶级斗争已经到了“革命农民群众同带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⑥的阶段,很多干部为避免犯错误,主持评定成分时多就高不就低,当问题被抬到阶级对抗的高度时,足以刺激他们绷紧的弦^⑦。

二是阶级分析标准的主观化倾向进一步加剧。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⑧来划分阶级,这一时期则进一步发展为除按经济地位和剥削关系划分阶级外,还将阶级觉悟和斗争情绪作为判断参加革命的坚定性与战斗性的重要标准,从而在阶级内部又区分出了一个新的群体——阶级异己分子。

比如中央给红军及各地方党部的训令中就提到要将那些“消极,失望,腐化,怠工,投机,动摇的异己分子,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下层组织中洗刷出去,将那些阶级意识坚定,工作情绪积极的好的干部——首先是工人贫雇农干部吸引到党的领导及组织中来”^⑨。而且,在党的文件中,阶级异己分子往往与“反革命”一同出现,或者称之为“叛徒”^⑩,在党看来,发现“阶级异己分子由动摇不满而走入反革命中间的过程”也是考验“阶级路线”实行以及工农政权“阶级性”的重要内容之一^⑪。

上述内外部环境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党分析政治形势和当前任务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从“二元对立”出发认识形势;二是情绪成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二元对立”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两个世界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与日趋死亡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对立。二是“两个政权的对立”。在中国境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对立。三是“两条路线的对立”。在党内,是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的对

立,但不久立三路线又被左倾教条主义所取代。立三路线主要是指“左”倾的空谈与盲动,而另一被批判的党内主要危险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则指对革命力量表示怀疑,对革命前途消极悲观、灰心失望,对党的任务消极怠工。但这两条错误路线是“相通的”,一遇到困难,“同样会要走到悲观失望的前途”^⑫。

“二元对立”本身就充满着紧张激烈的情绪,而这一时期,情绪不仅是分析的对象,也成为工作的内容。如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中对形势估计不足而产生的情绪进行了分析,概括起来就是松懈、盲目乐观等。又如在《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中,集中揭露了蒋介石将“日益高涨的劳苦民众反帝情绪抓到自己的领导下”以及将工农兵劳苦民众反对南京政府和整个国民党各派的不满情绪转向对外,缓和群众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愤懑情绪”的“可耻”企图^⑬。

对情绪的估计反映到工作的要求中,就是将情绪作为判断工作成效的标准之一。党多次号召打破群众浓厚的太平观念,帮助群众克服恐惧,“造成群众紧张和热烈一切为着战争的情绪”^⑭。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时,提出紧急任务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以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⑮。中央宣传部还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专门就“反对叛徒斗争中的革命积极性及各种不良的情绪”进行说明,将“征服”这些“个别的不良的情绪”作为开展反叛徒斗争的“必要条件”^⑯。

二、党的情感准则:阶级感情和斗争情绪的双重规制

威廉·雷迪曾指出,情感风格(emotional styles)的运作,是情感政治意义的关键。社会协作需要一个共享的情感风格,如果没有某种情感准则的标准化就无法实现协调的行动^⑰。与上述政治策略相对应,这一时期党形成了以阶级感情为中心和强调高昂的斗争情绪为特点的情感准则。所谓阶级感情,包含着对自己阶级的兄弟姐妹的同志般的爱和对阶级敌人的憎恶和仇恨^⑱,而斗争情绪则是考验布尔什维克

坚定性的重要标准,目的就是要“鼓起工农群众的战争热情和阶级决心”^⑨。具体表现在:

(一)对阶级敌人极端仇视

这一时期的阶级敌人主要包括以日本为主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阶级以及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对之均采取极端仇恨的态度。

中央要求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必须了解帝国主义与各派军阀政客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及苏维埃政权是抱着誓不并存的仇恨的”^⑩,要求全体红色战士“兴奋起我们无限的阶级仇恨”^⑪。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明确指出“党要煽动与加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仇恨,组织群众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⑫。

除了外部的敌人,苏区内针对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的斗争也十分激烈。苏区内“必须实行赤色恐怖”,对“一切对反革命表示纵容与宽恕的人都要受到党和苏维埃的严重的打击和处罚”。如肃反运动强调要“加深群众对于阶级敌人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阶级仇恨”^⑬。在查田运动中,称地主是“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凶恶的敌人”^⑭。

(二)对阶级兄弟友爱团结

与号召对反动统治的“愤恨”相对的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热忱”。这一“热忱”建立在对工农兵兄弟和世界受压迫无产阶级的友爱团结之上。党的各类通电抬头多是“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也有具体到工农兵、学生和城市贫民,言下之意,只有上述群体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当时苏区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为《三字经》,第一页就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⑮

而且这种“阶级爱”打破了性别以及国界的区隔。如中共指出国民党与其他一切反动派别的欺骗方法的共同点就在于“以性的分别来代替阶级的分别,以单纯的‘妇女问题’来代替劳动妇女的阶级利益”,强调要“根据劳动妇女的特殊地位与痛苦,尽量发动她们为本身的阶级的利益而奋斗”^⑯。这一时期对日本工农士兵的态度也是体现这种“阶级爱”的重要例证,中共提出“日本的兵士弟兄们同中国的劳苦

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明确指出:“与日本军阀及法西斯蒂的战争和恐怖作英勇斗争的日本工农,亦是我们的同盟者!”^⑰此外还有包括高丽人、蒙古人等,将他们视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同盟者。

(三)苏区内部荣耻对照

在苏区,党全力营造以当红军、支援苏维埃建设为光荣,以开小差、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破坏苏维埃巩固为羞耻的风气。

苏维埃政府不仅颁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及抚恤办法,还高度肯定红军地位,指出红军“是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的铁拳与拱卫者。反动统治正在你们的威力之下发抖,而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则感受极强烈的兴奋与欢欣”^⑱。强调要使广大工农群众认识当红军不仅是义务,而且是工农阶级的特有权利,一切剥削者这种权利都被剥夺了^⑲。

对于开小差逃跑等行为,则是坚决无情打击。如军事动员“要做到每个红色战士非因伤病不能离开队伍”^⑳。动员群众,“使群众认为‘开小差是对革命怠工’‘开小差是帮助敌人’。引起群众对开小差的愤怒和鄙视”^㉑。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加剧,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的命令,前三条拖枪逃跑、组织逃跑以及屡次逃跑并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将分别被处以“就地枪决”“公审枪决”“有期徒刑直到枪决”^㉒。

(四)一切恐惧动摇消极悲观都是有害的

一切恐惧动摇消极悲观情绪在党看来都是极端有害的,“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㉓。党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消极不悲观,……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和胜利的信心来克服一切的困难和障碍”^㉔。

当时邓小平、毛泽覃、陆定一等都曾被作为机会主义动摇的典型加以批判。而对毛泽东、刘少奇的批评,也是照此逻辑。宁都会议认为毛泽东“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存在“等待观念的错误”^㉕,指出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㉖。张闻天则在《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中多处批评刘少

奇的职工运动报告是对中国工人运动“悲观失望的估计”。

这一情感准则,不仅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突出体现。如群众慰劳伤病战士时,一般是肯定伤病同志的“痛苦”,将之称为“是与阶级敌人肉搏的创痕”,伤病战士则回以感激、快乐和决心。又如在追悼大会,强调到会者“都带着严肃的悲壮的脸色——不是失望的悲哀,哭泣……”^⑤;在集中、欢送新战士活动中,将家属哭泣视为大敌,为了避免引发新战士的“悲伤”,强调要发动妇女,耐心说服,鼓动她们起来举行热情的欢送^⑥。总之,就是要“拿革命的热情来冲破右倾的消极与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失败情绪,来创造出新的,从前所没有的”^⑦。

情感既有其“效价”,又有“强度”。“效价”主要指情感对事物、事件或环境的愉悦或不愉悦的反映;“强度”则相当于“唤醒水平”,上述两者都与目标相关^⑧。就这一时期的情感准则而言,在效价方面,正负向的情感都有其明确的对象,而在强度方面则都是高唤醒状态。因此,这一时期的情感准则存在着极化特征。阶级感情的划分决定了情感表达的单向流动,斗争情绪则是对情感唤起的高阶要求,两者缺一不可,这使得情感唤醒的目标之具体和范围之大与情感表达的方式之单一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一情感准则下的个体或群体,不得不时时处于一种深度激活的状态,从而保证对目标的高度认同与有效执行。

三、党的宣传动员:造成一种热烈紧张的革命空气

在情感体制的形成过程中,除了特定的情感准则外,表达上述标准的情感的仪式、实践不可或缺。本文主要从宣传动员进行分析。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动员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式就是“造成一种xxx革命空气”,一般与“浓厚的”“热烈的”“紧张的”等词联系在一起,这一描述,实质上就是前述情感准则经由宣传动员深入群众的过程。此处主要以《红色中华》为例展开分析。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为“党团政

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从周刊变为三日报^⑨。在瑞金共出版240期,发行量最大时达到4万份,是当时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⑩。此外,在以农民为主要群体的苏区,以贴报处、俱乐部、列宁室等为依托的公共阅读也使得《红色中华》的“反复阅读”成为可能^⑪。

当时党报论文“对于下级党部应带指示文件的性质”^⑫,也是干部的“学校”^⑬,这使得《红色中华》既是重要的宣传媒介,也提供宣传材料、供给宣传经验、规范宣传模式,因此,它的宣传不仅成为根据地宣传动员的“样本”,也作为“指导者”,嵌入到根据地宣传动员的整体运作中,成为上述情感准则的有力载体。

(一)“脸谱化”的敌我形象呈现

“情感表达”的直接体现就是内容文本。这一时期的宣传内容主要围绕“三位一体”的口号展开,即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的统治,保卫中华苏维埃拥护苏联。通过强烈的对比,这一时期敌我形象的呈现都是“脸谱化”的,从而强化了敌我双方的情感对立。

围绕上述内容,《红色中华》的报道可分为四类:一是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残暴统治的消息动态及其国内的动乱,以及各帝国主义蓄谋进攻苏联的阴谋;二是国民党卖国投降的举措及其统治下的悲惨景象和暴行;三是苏联欣欣向荣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美好生活及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声援;四是红军的胜利消息和中国苏维埃内部的政策法令、运动开展情况。

上述鲜明的态度还体现在敌我的修饰语上。如日本帝国主义是“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国际联盟被认为是“国际强盗分赃集团”,国民党往往被冠以帝国主义的“走狗”“内奸”“清道夫”^⑭,阶级叛徒则被称为“革命的卖淫妇”。个别人物自然也不会被放过,如“卖国罪魁”“中国工农的刽子手”蒋介石,“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汪契弟精卫”,“儿皇帝”“玩偶”溥仪等。

《红色中华》还常在版面的顶部横排或纵排刊登有各式相应主题的标语口号,且与时事和任务紧密

相连,如“‘五卅’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平津血腥屠杀华北民众”“加入红军回答国民党白色恐怖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又如“九一八”二周年整版以“日历”的形式刊登“满洲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罪行。

《红色中华》的标题也具有特色,大多由引题、主题、副题三部分构成,共同构成一个判断-证明句式,使读者时时处于编者“意见”的包围中。如报道1931年底蒋介石辞职,引题为“工农群众一致反对的国民党军阀”,主题是“蒋介石倒台了”,副题是“是红军三次胜利打倒的是一万万灾民要饭吃打倒的是全国反帝运动高涨打倒的”^⑥。此外,《红色中华》还常以在正文中夹注的形式加以评论。如报道汪精卫在行政院的演说时,几乎逐字逐句反驳^⑦。

通过上述两极对立的鲜明呈现,勾勒出一幅“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没落与死亡”与“苏维埃运动的必然的发展与兴盛”的景象,凸显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残暴和无耻。

(二)多层次的宣传网络渗透

判断情感体制严格与否的指标之一就是情感准则的适用范围和时段^⑧。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红色中华》上出现的宣传形式就有示威游行、问答晚会等二十余种,这些活动密切结合党的宣传目标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既通过公共空间和公众媒介的展示,也通过人情关系网络全面渗透到群众的日常中,而《红色中华》的“二次展示”,既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宣传形式的窗口,其报道本身也与这些宣传形式形成一种“叠加”,强化了其中承载的情感准则的影响力。

当时各种纪念活动开展十分活跃,营造了苏区内部友爱团结的热闹景象。“二七”纪念、“三八”妇女节、“红五月”、“八一”红军成立纪念、“九一八”周年、十月革命、广州暴动等纪念日均有活动展开,如“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瑞金举行反帝宣传展览会,3天内有三千余群众参观,之后还在苏区各地巡回展出^⑨。而各种群众集会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一般强调:参加人数众多且均举旗子带武器、会场秩序井然、演说热烈、会后必呼口号,现场“群众非常高

兴,面色上表露十分赞成”,“大家欢欣而散”。

除了弥漫的庆祝活动,公审也是情感准则展演的重要舞台。中央在给石城县的信中就写道:“要把坚[反]革命的分子及群众恨恶的豪绅地主,当着群众面前枪决并宣布其罪恶。”^⑩报纸会报道公审过程,通常包括审判、戴高帽游街并供述罪行,还设置专栏全文刊登判决书,包括审理人员、被告人罪状、审判结果三个部分,结果多是处以死刑,罪状不限于平素压迫和欺侮贫苦群众、私通接济白匪、杀人抢劫奸淫、反水多次等。这既彰显了工农群众的主体地位,又巩固和提升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对反革命则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报纸还时常刊登家信,显示了情感准则已经渗入到家庭的日常交往中。如一封红色战士的家信中,哥哥写给弟弟:“在红军中真是快乐,真是光荣!”嘱咐弟弟提早秋耕、借谷给红军、公债票退还公家不要本钱,并“致以革命胜利的敬礼”^⑪;还有妇女写给丈夫的《“不去当红军就同你离婚”》,儿童写给指战员的《可恨父母生我们太迟》等,都是强调当红军光荣,想家开小差可耻,落款还注有“家庭生活服从战争的敬礼”。

(三)高密度的运动竞赛批评

在情感体制的形成中,诱发的目标冲突则是一种超距效果(the effects at a distance),即达到威慑或以儆效尤的效果,包括了对那些偏离了情感准则的行为实施惩戒的政策^⑫。这一时期各种运动和竞赛接连不断,报纸编辑部经常根据中央的号召直接组织各种竞赛,涉及扩红、推销公债、节省经济、退还公债、收集粮食等等,报纸还专门设立了“红板”“黑板”等栏目进行表扬批评,由此形成了比帮赶超、荣耻相照的氛围,决定了群众运动中不许有旁观者,也不能有掉队者。

在查田运动中,《红色中华》多次开辟“查田运动专号”^⑬,刊登八县查田运动竞赛条约^⑭。在扩红运动中,也开辟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专号”^⑮。评选公布“拿么温”“顶呱呱”“模范队”,整版刊发光荣榜及各地发来的贺电和请求书也极为普遍。与“光荣”的红板相对的是“可耻”的黑板及火药味十足的批评

与自我批评。“突击队”是《红色中华》的重要栏目,后来改为“铁棍”“无产阶级的铁锤”“党的生活”等栏目,主要是指名道姓对苏区内各种不良风气进行揭露,内容简短具体,语气辛辣直接。如第65期,顶部横排通栏标题:给一切官僚主义者和开小差退却逃跑分子以无产阶级铁锤痛击!又如一篇自我批评,开篇自认“是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者”,列举了其冒领抚恤金,从慰劳伤病员的慰劳品中“‘自私自利’拿了毛线一件,小瓶的牛乳二瓶”,以及在工作中消极怠工等情形,最后表示:“我不是以悲口与哭泣来追悔我自己的错误,是要露骨的揭发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自己与自己作不调和的斗争。”^⑦

在苏区内部,在革命紧张的环境下,贪污浪费也被严厉禁止,“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⑧。政府还号召检举,指出只有把“贪污浪费分子除掉了,其他的工作人员以至广大群众将更加兴奋起来”^⑨。

(四)情绪化的修辞句式表达

严格的情感体制不仅要求个体表达规范的情感并避免离经叛道的情感,而且要求在适当的情形下彻底表达这些情感,以期这些标准的情感会得到增强并成为惯习^⑩。这意味着不仅拒绝表达标准情感的人将受到处罚,那些表达强度不够的人一样也会面临巨大压力。这一时期《红色中华》的报道中,使用的词汇、句式、标点符号等无不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由此规定了情感表达的强度与力度。

首先就词汇而言,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情感词,还有大量程度副词和褒贬鲜明的形容词。如形容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众身处“浩劫”“十八层地狱”“悲惨的绝境”,“惊惶,不安,怨恨,忿怒与斗争的情绪,紧张到了极点。”^⑪常见还有“你死我活”“生死关头”“死对头”等^⑫。

程度副词更是数不胜数,论及形势常是“十二分的紧迫”,执行任务则“必须加速度的活动起来”“十倍努力”“十倍积极”,达成目标则“直到最后一滴血,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此类“不让……一个”等句式;在战争动员中强调形势日益紧迫,全力动员、

最大速度,充分准备一切战争工作,强调“胜利当然属于我们的”^⑬。日益、全力、最大、一切、当然等词语都具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上述词汇决不是“空喊”,而是显示着对革命的信心和对敌人的态度。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上有集中的体现。《红色中华》1933年1月28日首次刊登时写的是“停战协定”,后来专门在1933年2月7日第一版发布“紧要更正”,强调“停战协定”四字应为“作战协定”。这一修改意图或可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平津的宣言中看出:“国民党军阀政客们,企图把苏维埃政府愿意与抗日部队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的宣言,当做是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懦弱的表示,可是这正表示了他们的蠢笨与无耻。”^⑭由此可见,从“停战”到“作战”协定,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中共强烈的行动态度与积极的进攻意图。

其次是句式。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句式是排比、设问句。如号召实行赤色恐怖,“迅速的捉杀反革命,肃清一切苏区内的反革命,造谣捣乱的杀!当敌人侦探的杀!暗中破坏革命的杀!领导反水的杀!”^⑮又如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写道:“工友们!你们为什么会失业挨饿?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劳动农人们!你们为什么会破产,饥荒,水旱病疫,卖妻鬻子呢?这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⑯

最后在标点符号上,感叹号、着重号都极为普遍。如在扩红总结中,号召“大家都下着决心再来干!干!!干!!!”^⑰,在揭露国民党统治时,标题部分加粗并写道:“鄂豫皖的白色恐怖请看!国民党军阀的真面目改良欺骗无人相信武断宣传全失效力只有杀!烧!烧!杀!”^⑱

(五)嵌入式的情感指导展示

报纸也会直接指导情感表达的方式,类似于情感史研究学者在研究中世纪的情感准则时的“礼仪指导手册”或者“建议指南”,对情感表达的话语和行为实践进行了直接、明确的规定。

报纸经常刊登“宣传方法的介绍”,如介绍动员

群众回家的工作方法中就包括组织流动宣传鼓动组挨家挨户口头宣传揭破反派欺骗、处决组织领导反水的首领^⑨。又比如在火线喊话中，“把三恨三想讲给白军听”被作为“一个模范的瓦解白军工作的实际例子”加以推广^⑩。报纸还开辟“通讯活”专栏，指导通讯员写作。它要求在每个通讯中“最显明的描写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组织性”，以及“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斗争情绪”^⑪。

此外还有文艺副刊“赤焰”“戏剧评论”等栏目，刊登各类文艺作品及演出剧目。目的是“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⑫。比如报纸曾连续刊登对工农剧社排演的剧目《谁的罪恶》的批评。剧本内容取材于非洲黑人被卷入世界大战而牺牲的悲惨故事。该剧首演就遭到批评：黑人被迫从军，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抗和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主人公回来时，受了四年残酷的无代价而牺牲的教训，是不应该那么高兴的；饰演母亲的演员把母性的爱演得太过分，不免把观众的注意力更吸引到“反对战争”的残酷上面上去，效果会使一般母亲只爱儿子，忘记鼓动自己的儿子去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⑬。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宣传动员正如《红色中华》“赤焰”这一栏目名称所传递出的意象那样，既突出表明了中共所倡导的强烈的阶级斗争内涵，又生动再现了前述情感准则作用的过程，造成了苏区紧张热烈的革命氛围。

四、党的情感体制的初步建立及其影响

在上述情感准则与宣传动员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了严格的情感体制。综上所述，严格的情感体制对于个体的情感表达至少有三层规制：第一是情感表达的选项是有限的；第二是情感表达的限制是绝对的；第三是情感表达的力度是高位运行的。从上述宣传动员的内容不难看出上述限制，对敌我鲜明的爱憎；多层的宣传网络及高密度的运动竞赛批评确保上述情感准则的彻底施行，荣耻的强烈对照也为情感表达画出了明显的界限，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情绪化的修辞和宣传指导强化了情感表达的色彩，要求高强度的情感投入。这

在当时既确保了内部的团结与统一，最大程度上动员了苏区的人力物力，但也在党内及苏区引发了一定范围的情感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

毛泽东曾评价这一时期：“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⑭斯诺在踏上“探寻红色中国”的道路之时所观察到的外界对于中共的印象——“几千名饥饿的土匪”或是“中国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⑮，也说明了当时两极分化的态势。

就积极方面而言，正如黄道炫所指出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人对苏维埃时期更多抱怀念、同情和尊重态度^⑯。毛主席就曾讲到：“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⑰黄克诚在1945年七大召开之时还提到“无一个根据地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⑱

而在苏区外，舆论界对于中共在苏区的宣传动员也印象深刻。《大公报》就注意到，中共扬言根本改造群众对自身痛苦之漠然态度，“闻共党集众讲说时，常从群众切身利益上，反复引证事实，以揭穿向日‘缙绅阶级’之罪恶”^⑲。在中共撤出中央苏区后，大批记者进入苏区，眼看“所到之处无不标语写遍墙壁”^⑳，而前述《红色中华》对运动之号召、表扬与批判的鲜明特征也引起《大公报》注意^㉑。也有党外人士如丁文江撰文请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㉒。

但严格的情感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恐慌和压抑。其关键在于它所呈现的关于人性和人的可能性的图景是不完整的、矛盾的^㉓。由于严格的情感准则以及无处不在的宣传动员，情感自由受到巨大的限制，使得个体可以寻求放松与转移的情感庇护所(emotional refuge)被极大地压缩了，由此引发了一定的“情感痛苦”。

不同于身体上的疼痛，威廉·雷迪所说的“情感痛苦”是由目标冲突所引发的，既可能导向“情感努力”(emotional effort)，即服从情感准则，坚持目标或行动计划的实现，也可能通向“情感自由”，即挑战指导

当下情感管理的高级目标的统治,从而改变目标。可以说,“情感痛苦”既是动力,也是压力。这也导致不同状况下的人对“情感痛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有所不同。

在苏区内部,由于斗争的尖锐化,肃反一度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现象”,“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相互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⑧。在第五次反“围剿”即将开展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推出查田运动,结果事与愿违,造成苏区群众的普遍恐慌,事实上,中央苏区成规模的群众逃跑现象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⑨。而逃跑也可视为对特定情感体制的逃离。

而且,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虽将红旗插遍全国为目标,却难以容纳更多元的情感表达,尤其是无法与当时“抗日救亡”的主流情感表达所呼应。

这一时期“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显示了在民族危机面前阶级感情的困境。党的文件就提到党内同志对“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口号表示怀疑与动摇,甚至对于“民族”二字表示畏惧^⑩。在中央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也提到“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的例子:“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传上,有同志认为主要的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之上,而把‘拥护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苏联’与‘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⑪

而在苏区,由于地处偏僻又处于包围中,反帝宣传也很难引发共鸣。中共湘鄂西省委提到全省反帝工作没有建立起来,其首要原因就是:“认为苏区内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对象。”^⑫而中共“联合中日劳苦大众,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也有空想意味。当时大名鼎鼎的恋爱小说家张资平就发文表示“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或有联合的可能,但中日的劳苦大众,我深信永无联合的一天”^⑬。

此时中共对国民党及地方军阀一刀切的宣传也使部分潜在盟友被排除在外。如在上海与日军鏖战而备受瞩目的十九路军将领以及在东北一度因抗日

而被全国各大报刊冠以“民族英雄”的马占山等,都被中共斥之为国民党的“欺骗”,归于军阀之列。此外,这一时期的反帝统一战线主要是针对下层,在党看来:“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⑭

五、余论

实际上,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的政治策略和情感准则在1934年春已经有所松动。4月20日,中央向各省委、市委、县委发出一封《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的秘密指示信,不仅强调印数有限,不要翻印,以口头形式向干部解释,还要求对附件《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单独印发,征求签名,并强调“不要先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党要以“拥护者”的姿态出现,而非“提出者”。中央如此慎重,与这封信中政策目标的重大转变有密切关系。

该信明确指出: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⑮,将动员的力量从原来以工农为中心扩充为一切反日力量,反帝统一战线也变为反日统一战线。信后还专门指出在实行这个策略时,既要防止误解为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国民党斗争,又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分子惯用左倾词句的情绪,而企图将这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的”^⑯。

但这一秘密指示信发出后,各地党部大多反应缓慢,在3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部除上海、广州外,中央未接到任何关于这一运动具体进展情况的报告^⑰。7月26日,中央再次发出秘密通知重申上述精神^⑱。直到9月21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才在《红色中华》上刊出,列有宋庆龄、何香凝等党外人士的签名。

更明显的转变出现在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文中一改以往激进的语调,指出把党的总的进攻路线解释成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是“对于革命的抽象

的了解”，会“限制自己的活动”，最后的口号也变成了“在这一血战中，我们会胜利，我们能够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这与此前一直强调的“我们当然会胜利”相比，显然从断定转为了希望。这篇文章所透露出的态度转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时早已被撤销职务，根本无从知晓中央决策的陆定一，仅通过这篇报道字里行间的异样，就发现了中央的新动向：文中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需要“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方法”，包括“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等，使陆定一敏锐地察觉到这和原来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一寸土地”有着明显的差别，也许暗示着红军有转移的可能^①。显然，这既得益于他的工作经验，也离不开他长期浸润在这一情感体制内所形成的敏锐直觉。

不久，中央就发出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训令虽一再强调将这一方针曲解为“退却路线”是“与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但仍预先估计到留在苏区继续游击战争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可以而且必然产生一些悲观失望，抱怨丧气的情绪”，并对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宽容，后文更没有诸如“无情打击”“残酷消灭”之类的词语，而是强调：“党应该经过许多解释与教育工作，把全党同志和睦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②

综上所述，党中央对上述转变如此慎重，可见其对此可能在党内外引发的震动有充分估计，毕竟一直以来党所奉行和宣传的情感准则都是强调两极对立，只许正向情感表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党本身也被一直以来严格的情感体制所束缚了。

威廉·雷迪曾指出，情感是个人生活的中心，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具有最高的政治意义，任何持久的政治政权都必须建立一种情感的规范秩序，一种“情感体制”^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政权和国家概念的提出，不仅使得人们对一切问题的考虑偏向政治化，同时必然会激起人们进攻和决战的强烈心理，从而再度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情绪^④。而处于“围剿”之中的中央苏区“长期处在比较‘孤立’的环境”，环境与人的关系比较“纯粹”^⑤，使得严格的

情感体制较少受到外界影响。

从媒介的角度出发，中央苏区时期也被认为是新闻媒介国家化与国家权力中心化的重要开端^⑥，这种中心化的趋势使得党的情感准则能够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和确定的区域里持续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渗透并作用，换句话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情感准则才有可能扩散、强化成为一种情感体制，从而对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群产生影响。这种情感作用的机制相比此前党针对特定群体如工人、学生，以及特定事件如罢工、游行所进行的宣传动员，影响的范围、渗透的深度、动员的强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本文所强调的，不是将情感仅仅视为一种宣传动员的技术，而是指出情感准则对宣传动员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它作用于宣传动员的内容、形式、策略、手法和取向等各个方面，由此建立的情感体制是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的。

由此出发考察后来中共关于宣传动员的认识以及宣传动员手段的运用，不难发现其影响之深远。如《解放日报》改版时所揭橥的四性之一的“战斗性”，也是这种强调情感工作和强烈的斗争情绪的情感体制在宣传动员上的反映。再比如“以正面宣传为主”观念的形成，其雏形首先出现在文艺领域，表现为“歌颂”与“暴露”的文学创作风格的争论，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被统一修正概括为“写光明为主”原则^⑦。这一原则其实也是党内强调正面情感表达这一情感准则在宣传动员工作上的反映。

总的来说，革命者是积极乐观、欢欣愉悦，革命氛围是紧张活泼、团结向上，革命前途是光明灿烂、充满希望，这一整套的情感准则再加上宣传动员的作用，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如“赤焰”一般的情感体制，实际上奠定了“红色中国”的主色调和主基调，“红”所包含的鲜明的阶级情感与昂扬的斗争情绪，此后虽经形势变化或浓或淡，但这一情感体制的内核却得到了保存和延续。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50页。

②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③陈信凌、邱世玲:《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框架的最早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7期。

④如唐国平、宁叙通:《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的抗日宣传动员研究》,《新闻春秋》2022年第4期;邓密生:《中央苏区党的宣传动员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8年;任伟:《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对敌宣传动员的策略与技巧——以兵士运动为中心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

⑤陈金龙:《从情感维度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3期。

⑥[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冠男、何翔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⑦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

⑧Eustace, N., Lean, E., Livingston, J., Plamper, J., Reddy, W. M., & Rosenwein, B. H.,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7, no. 5, 2012, pp. 1486-1531.

⑨Matt, S. & Stearns, P. N., *Doing Emotions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 p. 1.

⑩如王晴佳、孙一萍等对国外情感史研究的成果作了一些介绍,威廉·雷迪的情感史著作《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也已在202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⑪李宇:《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动员——以1946-1948年北方土改中的“诉苦”与“翻身”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⑫Barclay, Katie,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 Student Guide to Methods and Sources*, London: Red Globe Press, 2020, p. 8.

⑬Steams, P. N., & Steams, C. Z.,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0, no. 4, 1985, pp. 813-836.

⑭Rosenwein, B. H.,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7, no 3, 2002, pp. 821-845.

⑮ 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1.

⑯在描述一个社会、文化或某一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情感表达模式和规范时,不同的学者使用乃至创造了不同的词汇,如 emotional standard、emotional norms、emotional code、emotional style 等,国内译为情感准则、情感规范、情感标准、情感模式等等,本文译为“情感准则”,这与本文使用的威廉·雷迪的理论有关。威廉·雷迪在表达上述意思时使用了 normative emotions 一词,即规范的情感,但他在书中同样使用 emotional discipline 表达同样意思,再加之情感体制所具有的统一和强制意味,将上述意思译为“情感准则”似乎更为适合。

⑰Plamper, Ja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Keith Trib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61.

⑱Reddy, William M.,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8, no. 3, 1997, pp. 327-351.

⑲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9.

⑳Rosenwein, B. H., & Cristiani, 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p. 54.

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红色中华》1933年12月8日,第1版;博古:《“我的位置在那边,在前线上,站在战线的最前面!”》,《红色中华》1934年5月16日,第1版。

㉒Yoshihiro Ishikawa, & Craig A Smith., "Line Struggle," in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eds.,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and Verso Books, 2019, pp. 115-117.

㉓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㉔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2-773,802页。

㉕1931年12月1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第六号训令对于肃反问题规定,对犯人的处置分阶级成份与首要、附和来判罪。项英:《写在前面的几句话》,《红色中华》1932年3月2日,第7版。

㉖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红色中华》1933年6月17日,第3版。

②⑦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6-300页。

②⑧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②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07页。

③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③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9页。

③⑫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2-483页。

③⑬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7-278页。

③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③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7-68页。

③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3-134页。

③⑰Eustace, N., Lean, E., Livingston, J., Plamper, J., Reddy, W. M., & Rosenwein, B. H.,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7, no. 5, 2012, pp 1486-1531.

③⑱Haiyan, Lee, "Class Feeling", in Christian Sorace, Ivan Franceschini and Nicholas Loubere, eds.,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Concepts from Mao to Xi*,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and Verso Books, 2019, pp. 23-29.

③⑲《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红色中华》1932年10月16日,第1版。

④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④⑪《中国工农红军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4日,第7版。

④⑫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56页。

④⑬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8页。

④⑭《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红色中华》1933年6月20日,第2版。

④⑮李祚煌:《江西省立列宁第二师范学校》,《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

④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

④⑰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④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红军电》,《红色中华》1932年6月30日,第1版。

④⑲《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红色中华》1932年9月20日,第1-3版。

⑤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43页。

⑤⑪《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红色中华》1932年9月20日,第1-3版。

⑤⑫《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第1版。

⑤⑬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

⑤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⑤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30页。

⑤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43页。

⑤⑰《踏着顾作霖同志的道路武装上前线去!》,《红色中华》1934年6月1日,第1版。

⑤⑱《瑞金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中的宝贵经验》,《红色中华》1934年5月30日,第1版。

⑤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

⑥⑩[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8-30页。

⑥⑪柯华主编:《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第167页。

⑥⑫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页。

⑥⑬比如各村各部队设置的“列宁室”,“里边有墙报栏,有《红色中华报》、《青年实话》等报刊,向大家介绍革命基础知识

和社会知识,能识字的自己阅读,不识字的就听别人念”,参见萧华传记组编:《回忆萧华——纪念开国上将萧华诞辰100周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另外,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也提到读报团的工作,其中就包括《红中》。参见《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页。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051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告民众书》,《红色中华》1932年7月14日,第8版。

⑦《蒋介石倒台了》,《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8日,第3版。

⑧《汪精卫又在行欺骗》,《红色中华》1932年2月17日,第4版。

⑨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5.

⑩《怎样纪念今年“九一八”》,《红色中华》1933年9月15日,第1版;《反帝宣传展览会胜利的成功了》,《红色中华》1933年9月27日,第6版。

⑪《中央给石城县信》,《红色中华》1932年9月6日,第8版。

⑫《一封红色战士的家信》,《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3版。

⑬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9.

⑭《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红色中华》1933年6月20日,第2版。

⑮《八县查田运动竞赛条约》,《红色中华》1933年7月5日,第6版。

⑯《红色中华》1933年6月11日,第5版。

⑰《火力向着贪污腐化 欧阳仪同志的自我批评》,《红色中华》1933年8月13日,第6版。

⑱项英:《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红色中华》1932年3月2日,第6版。

⑲《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红色中华》1934年1月4日,第2版。

⑳ 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5.

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㉒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10页。

㉓《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红色中华》1932年10月16日,第1-2版。

㉔《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红色中华》1933年3月9日,第1版。

㉕《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为坚决进攻敌人恢复门岭保卫会昌保卫全省告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书》,《红色中华》1934年5月14日,第2版。

㉖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9-371页。

㉗《上杭县第一期扩大红军的总结》,《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4日,第5版。

㉘《请看! 国民党军阀的真面目》,《红色中华》1933年1月7日,第1版。

㉙《一个模范的争取被欺骗群众回家的例子》,《红色中华》1934年9月8日,第3版。

㉚《一个模范的瓦解白军工作的实际例子》,《红色中华》1934年9月23日,第4版。

㉛《写给通讯员》,《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4版。

㉜《写在前面》,《红色中华》1933年4月23日,第5版。

㉝《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的晚会》,《红色中华》1933年8月4日,第8版。

㉞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0页。

㉟[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页。

㊱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苏区研究》2020年第3期。

㊲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5页。

㊳黄克诚:《黄克诚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374页。

㊴范朴斋:《“剿共”之根本问题》,《大公报》1932年7月29日,第3版。

㊵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35页。

㊶《赣省收复匪区现况(续)本报特派员视察记》,《大公报》

1935年2月12日,第4版。

⑩丁文江:《丁文江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52-153页。

⑪[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7-168页。

⑫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⑬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

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2页。

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5页。

⑯中央档案馆等编:《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内部使用,1986年,第247页。

⑰张资平:《从早上到下午》,《文艺座谈》1933年第1卷第1期。

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1页。

⑳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1页。

㉒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7页。

㉓陈清泉:《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

㉔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4页。

㉕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4.

㉖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㉗总政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3),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715页。

㉘贺碧霄:《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情报/宣传一体两面新闻制度的形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㉙叶俊:《中国共产党“以正面宣传为主”观念的历史考察》,《新闻春秋》2021年第2期。

Red Flame Burning Hearts: Propaganda Mobilization and the Normative Emo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Ding Liqiong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sa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CPC)first attempt to govern in local areas and the beginning of its emotional regime. Under severe external pressure, informed by class analysis, the CPC formed emotional disciplines with class feelings as the center, while emphasizing high emotions for struggles. Emotional norms were strengthened and propagated through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This created a tense and fierce revolutionary atmosphere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rough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the enemy and us, multi-level propaganda network infiltration, high-density mass movements, competitions and sharp criticisms, emotional rhetorical expression, and embedded emotional guidance. It thus formed a strict emotional regime of the CPC. Emotion help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CPC's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its powerful ability in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